

宋教仁談華僑

兩星期前，電台、電視台的新聞報道說，有個學術機構向七、八百人調查，一旦中國共產黨接收香港，他們將離開呢，還是仍然留着。據說，大多數都想離開香港，最多人想往美國，其次才是西歐云云。

假使真有這樣的事發生，這批年青的中國人（調查所得，發表此言論者皆為年青人）到了外國定居，初步則為難民，再而成為入籍的公民了。又再過十年八年，其中必有優秀分子，在學術上有成就，在商業上發了大財，成為大集團的首腦，富可敵國，於是衣錦還鄉，中國政府的四化尚未完成（四化路遙，可以走六七十年而未到的，亦如五年計劃，可以一個完了又一個的也），自然請這批「華僑」出錢出力幫幫忙，完成大業。

一九五四年某日，我在創墾出版社和李微塵、徐訏、曹聚仁、李雨生等閑坐，不知是誰批評中共關緊門戶，限制人民自由出入國境，徐訏以幽默的態度微笑曰：「如果門戶開放，八九億人民走光了，還成甚麼人民共和國乎？」我聽後也頗以為然，此非笑話，實有此可能的。但一轉念間心裏對徐訏不免罵他為「反共分子」了。

一九五四到一九九七，有四十年那麼長，香港的青年人為甚麼要「逃避義務」，溜之大吉，要到西方國家去「入籍」，此中道理，的確耐人尋味。（十二月十九日，電視台映出奧地利有些波蘭僑民，聽說祖國有難，立即回國同赴國難。他們說，波蘭是我們的祖

國，祖國有難，我們有義務回去。我聽到後，暗暗叫聲慚愧，當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國時，我逃避義務，溜來香港「避難」，一避就避了四十三年。當時自知不對，還自己解釋說：「我有什麼本領呢？文不文，武不武，家在香港，為什麼不回來？」慚愧了一個短時期就過去了。）

《文匯報》十二月二十日刊登華僑歷史研究會，於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成立，展開華僑歷史的研究工作，當然會研究華僑在海外受人欺凌的事。近三十年，中國對於客居外國的華人，如果已經入了外國籍的就叫他們放棄華籍，這樣做法是對的。但也有不少華僑，既不願意入外國籍，又不歸心中國，以華人自豪，遇到當地排華時，他們又怨祖國軟弱，不能盡力保護華僑了。這種情形，近年多見於印尼和越南。

提到印尼，不免想起宋教仁有篇文章談到「入籍」的事。一九〇五、〇六年間，反清黨人在日本辦的《民報》，整天都罵清政府，亦如一九三九年香港某報在左派掌言論時那樣，整天都罵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宋教仁的大文叫《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

宋教仁那篇文章寫在七十六年前（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民報》第二號），當然是攻擊清政府不能保護華僑的了。這是反清的民黨之言。到了清政府被推翻，北洋政府上場，這個政府也是不像樣的，不提它也罷，但國民黨的政府，在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登台了，現在是它當起家了，忘記了二十年前在日本罵清廷不能保護華僑了，當然，它當然也不能保護華僑。國民黨當家當了二十年，只會「打虎頭」，一無所長，不去提它也罷。接手上來的是共產黨政府了，當起家來，的確不凡，中國人在國際上

大有面目，但仍然無法保護華僑，一任印尼人排華，殺人放火，華人慘不忍言。我不知當時有沒有華人富商求入美國籍一如宋教仁文中那個陳福祿一樣的。讀者請讀我摘錄宋先生的大文。

可憐哉，無政府保護之民乎！無論遇強國也，即當弱小之國亦有難堪者焉。南洋舍列伯司島，荷蘭領印度群島之一也。有華人三十餘萬在焉。全島五萬方里，土人近百萬，有四酋長自治，皆無大勢力。其官吏軍隊皆荷蘭人為之，其全島生計界之中樞，則悉握於華人之手，華人之勢力甚強。然荷蘭官吏甚虐待華人，不可言狀，清政府又不能保護，至於近日全島華人因日本戰勝，欲求歸化日本，藉以托庇，有陳福祿者，全島華商之巨擘也，乃親至日本，求日政府收容之，但日人以格於國際慣例，尚未允許也。

以上是敘事。所謂「日本戰勝」，蓋指日俄戰爭一役也。當時華商的確有不少想入日本籍以求庇護的，廈門、汕頭的商人，甚至和當地日本浪人勾結，求他們在日本領事館設法入籍，而日本也不「格於國際慣例」，財可通神，孔方兄交去，護照就飛來了。以下是宋文中的議論了。文云：

嗚呼！此三十萬人者，非皆我黃帝之子孫，我最親愛之同胞乎？徒以二百年前異族佔

據祖國，不能生聚教訓，以安其業，乃相牽去國門謀衣食糊其口於四方，叨天之幸，不藉國家之政策，得殖財產，長子孫，以雄視海外，其事亦良苦矣。……夫人孰不知愛國，然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亦人情所常有矣，我同胞固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後為此者也。（指入日本籍事。——引者）

宋教仁是同情陳福祿的處境的，但借此以抨擊清政府，其意當有如果我們能推翻異族統治，中國就強起來，外人不致虐待華僑了。這種美麗的幻想曲，同盟會黨人高唱之，國民黨人高唱之，打江山時期的共產黨人亦高唱之，然而七十年來高唱入雲，徒使「此曲只應天上有」而已矣，豈不嗚呼重嗚呼乎？

二十年後又談周福清

去年（一九八一年）二月出版的《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期（總第十一期。是北京出的一個季刊）有秦國經先生根據大內檔案的資料所寫的《內閣中書周福清》一文。這是一篇枯燥到極點的文章，但卻引起我的興趣不小，可以補充我二十年前所寫的兩篇文章。

張蒼先生在去年六月二日登在《新晚報》的一篇《讀〈魯迅研究資料〉第七輯》，文中提到拙著《聽雨樓隨筆初集》（該文把聽字誤植叫字，成為有趣的樓名了）有關周福清的史料兩篇。他說：

房兆楹的《關於周福清的史料》，這是國內魯迅研究專刊首次提出的一樁史料。過去周作人、周建人以及許廣平女士等的記事裏，這一項史料都只有晦隱的略作一提及，這次的極為詳盡地敘其始末真情，這是前所未見的。不過房兆楹的這篇史料，據文末題署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於美國加省大學圖書館」，原文刊載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灣出版的《大陸雜誌》半月刊第十五卷第十二期。則本輯的選錄這一篇史料，僅是轉載而非近年來國內人士之作。

這是說「第七輯」選錄的是轉載台灣刊物的張先生大文的末段有這幾句：

本港著名掌故作家高伯雨《聽雨樓隨筆初集》（一九六一年五月上海書局初版）曾收有兩篇周福清有關史料：一、《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二、《再談周福清》。前者寫成於一九五七年九月廿三日，則有關周福清科場通賄一案的史料整理，高先生之作早於房君。不知前此國內研究魯迅的刊物何以未加留意！

其實我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所作的那篇文章，也是非常簡略的，我在《再談周福清》一文（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寫成，交《星島日報》發表的），開頭便說：

我再讀周遐壽的《魯迅的故家》，一時高興，寫了一篇《魯迅的祖父周福清》。……當寫時，純是讀書後偶有所觸，並不顧慮到手頭的參考材料少……

如果那時蒐集更多材料，比較完備一些，國內研究魯迅的刊物的編輯先生，也許留意及之。房兆楹先生那篇文章我未見過，料想一定很精采，房先生在美國教學，有很好的圖書館供他利用，我則蜷居斗室，連向圖書館借書的條件都沒有，當然，其為草率自是意中事了。（香港兩大學的圖書館，關於科舉資料的書最缺乏。）

辛酉壬戌之間雜憶

辛酉年將逝，壬戌年快來，雜憶的事，不關一九八一，一九八二，而是倒流到民國十年辛酉，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一，一九二二），距今一甲子矣。

上一個辛酉的下半年，我還在家塾讀書，尚未到解館，我忽然有個機會到汕頭醫病。書塾通例，多在十二月十六以後解館，老師回家度歲，到下一年元宵節過後才來開學，學生先生有一個月假期，一年之中就只有這個假期較長，在學生來說是最快樂的日子。我未到十二月十六就「放假」，名為醫病，其實也病得很風流，在汕頭那一個多月中，吃花酒，看桂劇，風流快活，甚麼書本都拋向九霄雲外了。

我的病是很輕鬆的，原來這年的夏天，我每天下午都吃一大碗涼粉，而涼粉又是放在冰冷的井水中「鎮」到像冰一樣冷才撓起來吃，此即古人浮瓜沉李的消暑法。如此這般的「消暑」了三四個月，十月間忽然腳背浮腫，人以為腳氣病，嫡母對此並不怎樣關心，只叫人到藥材舖抓幾樣藥來吃，吃了也不見好，甚至在城裏頭頗有名的醫生丁夢蘭（是個大胖子，因排行第四，人呼為「丁四老」，即丁老四）也不想請來診視，愛惜那筆四五百錢的診金也。後來表兄林忠俊看不過眼，她才把丁醫生請來，吃了幾劑藥，稍有好轉。怎料此時丁醫生忽然想發財，不做醫生而往汕頭和朋友合資開設銀行，自任「家長」（潮州慣例，凡銀行、出入口商行的經理皆稱家長），忠俊又說服了嫡母帶我到汕頭就醫於丁四老。

我在汕頭這個短時期，約略懂得潮州的所謂銀行是甚麼性質。舊日的潮州人，有不少開設銀行而發了財的，但亦有因此而破產。我家在汕頭經營銀行業有三十年歷史，所設的銀行共五家，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夜之間全部倒閉，欠債百餘萬，而人欠的卻又一個錢都收不轉來，雖不徹底破產，然而拿出來作發行紙幣保證金的房地產損失大半。

潮州人口中的「開銀行」，其實所謂銀行者，錢莊耳。中國以前無銀行之稱，清光緒末年始有國營之大清銀行及商營之通商銀行，在此以前，凡經營銀錢匯兌者均名為票莊、錢莊。潮州人所設的銀行，正式名為銀莊，但人們在習慣上皆稱之為銀行，頗有「不虞之譽」。不過，如果以「走法律縫」來說，則稱銀行亦於法無不合。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正月十六日度支部奏定「銀行通行則例」十六條，奉旨施行。條例規定，凡做銀錢買賣及放款匯劃的店舖，總稱為銀行。則潮州人口中的銀行實振振有詞了。

丁四老不在故鄉安守他的崗位做醫生，偏要走往汕頭和人家合股開銀行，其中必有原因，但以事隔六十年，我已不大清楚，即使當時知道一些，亦已忘記了，只記得他的銀行開了不到一年就關門大吉，他仍返澄海懸壺濟世。他在潮州醫生中不算是名醫，但因為他的脾氣好，容易使人接近，沒有架子，病家請去看病，有時他穿了短褲拖着木屐就上門看病，並且所收的診金也不多。所以生意還是很好的。（澄海有個大醫生名謝熙和，架子大，診金高，普通人家不敢請他，他出門看病，有自備的轎子，穿州越府的為病人服務，有時趕不上再往別一鄉另一縣看病，就得住在先請他看病的那人的書齋，主人敬之如大賓，設

酒席款待，還要找人來陪他抽大煙。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我的大嫂有病，她的大子伯昂特地請謝醫來駐診，一連住在書齋七八天，午晚兩餐，皆叫酒館來排筵席。謝醫到夜裏十一點後才精神百倍，抽足了煙，然後切脈。之後，就抽煙到天亮才睡。如是者月餘，病愈，又不知送了多少酬金了。）

潮州人最羨慕人家開銀行，一個人能開銀行自然是有錢人，大為人尊敬。以我家來說，我們就和人合夥經營五家銀行，大房的伯壺姪亦和人合夥開設兩家，四嬸母亦於壬戌年（一九二二年）在汕頭開設一家，名叫勤發銀莊，叫她的長孫作新掛名做行長，而大權握在她手上，她每一兩月就出汕頭住在銀行裏坐鎮。聽說當時打的資本是四萬元。當時潮汕人士哄傳「高家的四太媽開銀行，資本十萬」，竟然吸收了不少存款。可惜她不懂做生意，她的乖孫更不懂，因為辛酉年七月在中學畢業，四嬸母為了培養他，馬上開銀行給他當經理。如果為了他好，做祖母的應該叫他做銀行學徒才是。

這位新鮮出爐的「貢爺」（民國初年，潮州人仍極重視前清的科名，高等小學畢業的稱秀才，中學畢業的貢生，大學畢業稱舉人，甚且在住宅大門及祠堂貼「捷報，貴府某某少爺，本屆某某學校畢業」的報喜條）對銀行業務絲毫不識，一朝權在手，就盡量花錢，賭博是其嗜好之一，晚晚在永平酒樓吃花酒，五六年間，把祖母二十年來積存的花白銀圓二十萬花光，勤發銀行還欠了一筆街賬。四嬸大怒，把作新的大權吊銷，捉他回澄海，於一九二八年，重新充加股本，派第二個孫子作梅做家長。作梅接手後，初時還規規矩矩，但不久後，也是花天酒地，結果勤發銀行不清還債項，於一九三〇年結束營業，但招

牌仍然掛着，辦理善後事務，我從歐洲回來，還可以到勤發閑談呢。

在丁四老醫生開銀行之前，有一位曾任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教員，秀才出身的黃峻六，人稱老師者，也在汕頭開設一家銀行，名叫有信銀莊，十年之間生意發達，於是以銀行為大本營，又做其他生意，在香港、天津、上海皆設有字號。黃老師發了財，大購良田，在日偽期間，他又以善價購入田畝不少，傳說有三千畝之多，因此有大地主之名。一九五九年不得不放棄一切「吉身」來香港，寄居在他的女婿杜鴻飛家中。（鴻飛在一九二三年澄海中學畢業後，即在有信銀行辦事，抗日戰爭時，在香港與王永銘等同設火柴廠，近二十年舉家居台灣，他和張群是兒女親家。）

我以前常有個疑問，黃老師以在澄海城中開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名叫啟明，何以會一朝「發達」，在汕頭開起銀行。近十年，我和香港的一位銀行家劉君（潮安人，香港的著名收藏賞鑑家，又為黃賓虹的入室弟子）談到澄海有兩個讀書人開銀行，一個發財，一個破產，甚至睡牀也賣掉才可以買一兩天的米來療飢，終於窮餓而死。破產的是詩人蔡竹銘。劉君說，那位黃老師忽然開銀行，是得到他的父親的幫助。他的父親早在新加坡開了銀行，有朋友勸他何不在家鄉也開一家，他可以介紹當地有名望的人和他合作。於是介紹這位秀才公和劉君合作。劉君是石叻客，又是開銀行的，在一般人的眼中已是有錢人了，老師和他在汕頭開銀行，老師自亦成為有錢階級了。從此黃老師漸漸發達，儼然為潮汕一個大紳士了。

黃老師得到這個憑藉，平步青雲，已非坐冷板凳的老秀才了，他自己又創辦一些生意，派他的長子到天津主持一家商行，他老人家在汕頭坐鎮，指揮各港生意，時時出巡，歷年都賺大錢。那位蔡竹銘秀才餓死時，黃老師的事業正達到高峯，那是民國廿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的事，而黃老師有了錢，也附庸風雅，託北京的吳柳隅（貫因）為他選購字畫，某一次我回汕頭，他特地有信設席招宴，請我為他評估一下。

汕頭自咸豐年間闢為商埠後，商業日見繁盛，銀行日多，還分開澄海幫、潮陽幫、客家幫等，中國銀行亦在民元設有支行，但營業不振，他只做代收國稅事務，和商場沒大關係，人家不相信它，沒有人敢把金錢存入生息。人民信任是本地人開設的銀莊——即口頭中所叫的銀行。因此汕頭的銀行業十分蓬勃，有些銀行還發行鈔票，通行潮州各縣，有幾家信譽好資本厚的銀行，它們的鈔票即在福建鄰近廣東的幾個縣分也能流通。

辛酉年年底我往汕頭醫足疾時，每天幾乎有大半天時間在汕頭各銀行走動，和我家有關的銀行有十多家，不是在這家吃午飯就在那一家吃晚飯，到九點以後就上酒樓吃花酒，直到十二點左右才入席，散席回家睡覺已是凌晨三四點了。這年的夏秋間，我家又和表兄們合資開設一家銀行名叫智發莊（一九二七年又在新加坡設分行，專辦僑匯，派表兄林一穆往主持，一穆原任智發莊寫信之職），因開辦時未找到鋪址，暫時借鎮邦街泰安莊一角之地營業。（亦是銀行，它的家長蔡明南，時年已六十餘，是先父的朋友。該莊亦是汕頭的老字號，到民國二十年後才歇業，潮籍著名學者黃際遇，是蔡的女婿，他每從外埠回澄

海，路經汕頭，即寄居其中。）

智發莊的家長是表兄林景若，由他組織成立，拉我家參加股份。林家不算是大富之家，汕頭沒多大生意，海外也沒有生意，既和我家有親戚關係，當然要「借光」一下，夫力宣傳是高家開設的，高家是大股東，不什麼，只要看有個「發」字就是最好的明證了。因為我家在香港的字號是元發行，暹羅元發盛、元章盛、玉利、新嘉坡元發棧、廣州成發、神戶文發，汕頭則有銀行嘉發、光發、裕發，米豆行則有永發、繼發，油廠棉發，織布局振發，人稱「發字號」。

舊式銀行的組織，其實與山西的票莊，上海的錢莊大同小異，汕頭的銀行，簡直就是錢莊，組織上師法上海而簡化之，主要職員為家長、交銀（司庫）、理數（會計）、跑街。家長和交銀，當然以股東裏頭的至親擔任，其餘職員，也是非親即故，絕不任用外人。

銀行的組成要素，當然是資本，股東出資本經營一家無限公司性質的銀行，所負的責任很大，因此開銀行的人如非家產富厚，平時信譽卓著者，不敢嘗試。但話雖如此，亦有一些小康之家，因親戚具此條件，就盡量「借光」。和我家有密切關係的光發、智發、鴻發盛如此，較後於一九三三年成立的億發亦無不如此。

智發莊在泰安莊內時，我只去過一兩次，第二次是我敲竹槓要陳少彭（名鶴年，是伯昂的表兄，任智發交銀）請往大舞台看桂劇，我到智發時，少彭正吃過晚飯，總結一天的營業賬目，我催他快些，戲快開鑼開台了。在大雨聲中我們六七人坐人力車往看戲。辛酉

末，智發搬往永安街，與鴻發盛銀行同租一幢三層洋樓，智發在二樓營業。壬戌年初七，我在三樓還親見到景若督率兩個工匠印鈔票，閑人不准進入大廳，我則例外。

「黨元老」發喻風

許崇智本是國民黨軍隊中的元老，一九〇五年在日本讀書時就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任福建第一師師長，此後十四年中，他都在廣東、福建兩省帶兵，蔣介石未發迹之前，當過他的參謀長。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以武人當過短期文職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這時候，廣州的國共兩黨鬥爭劇烈，蔣假裝革命討好蘇聯的頭頭，竭力排斥右派，於是許崇智就一蹶不振，手上無兵無勇，不能叱咤風雲，反而要看他的前參謀長的臉色了。正好，看在元老面上，國府委員之類的閑官有份，就是在台灣的小天地中，也有個「資政」好做，使臨終之時不至十分落寞。

這個粵軍宿將，自一九四九年後，就在香港做寓公，在一九五〇、五一年間，香港搞第三勢力的人有好些個，個個都抱着向花旗作狀，自認最有辦法，一定可以把共產黨趕出中國大陸，只要綠背源源匯到，大力宣傳海外和大陸上有許多忠貞愛國之士，為祖國奮鬥，共產政權垮台可卜。

搞第三勢力的人物，有張君勱，有桂系的小政客為左報謚為「風流小生」的程某某，有張大玉，有青年黨的謝澄平、左舜生，新興的則有一九五一年一月冒出來的許崇智。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八二年已三十一年了。我作此文時是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案上有一頁剪報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一日的《工商日報》。虧我有這樣濃的雅興，一頁舊報也

珍藏了三十一年。當時為什麼要剪存呢？說來幼稚得很，目的是想看看過氣黨國偉人的偉論到底有什麼價值。目的僅此而已。且看許崇智發表的「偉論」吧。該報的大題目是《黨國元老許崇智發表重要談話》，小題目概括內容說：「指出中國新的革命勢力將大大發展，台灣應與之通力合作共同對付共黨……中共將進攻越南，是為三次大戰之序幕。香港澳門之安全，視三次大戰而決定。」此為《工商日報》專訪的新聞，正文云：

黨國元老許崇智為澄清現時外間傳說之「第三勢力」及現階段中國當前之政治動向，昨日下午四時，特發表息隱本港四年來第二次之政治性談話。許氏雅不欲採用「第三勢力」之名詞。許氏指出，此是當今海內外一種新的革命勢力……

所謂「新的革命勢力」嚷了三十年，嚷到連出綠背支持過一個時期的花旗佬也改變了主意，和共產中國建交，「革命勢力志士」當場為之吹脹，大有棄婦之感。不過這班志士近二十年已死清，只剩下三五個能眼見此「悲劇」了。於是我重有感焉，偉人的偉論千萬勿信。

壬戌談往

現在已是壬戌年了，照例要回憶一下六十年前的舊事。我在香港賣文四十多年，在最近二十年中，每逢陰曆年正二月間，必定寫一篇什麼《壬寅談往》、《辛丑談往》、《丙辰談往》的文字，把六十年前的壬寅、辛丑、丙辰（一九〇二、一九〇一、一九一六）一些國家大事、名人軼聞等等回顧一下，有時略加評述，使留心國家社會的讀者得知六十年前中國有什麼事發生，鑑往知來，聊作開卷有益之助。

最近三年，我很光榮地得在《信報》的「二樓」點角之地，發表蕪詞，從未用過《辛酉談往》一類的題目來談往事，今年可不同了，要搬出《壬戌談往》來談一次，亦僅此一次而已，下一壬戌當在六十年後，休說香港不知如何，就是鄙人仍能健在，亦已年過一百三十歲，記憶力差，手又舞不動筆桿了。

我喜歡《信報》能給我無所不談百無禁忌的自由，因而把這個最好的題目——《壬戌談往》給它。我為什麼說它為最好的題目呢？凡談往一類的文字多帶歷史性，我之留心現代史事，始於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年），其時恰逢直奉第二次戰爭，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報紙上發通電臭罵國務總理、人稱財神的梁士詒，於是我找出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月份的上海《時報》來了解一下北方的政局。從此時起，我才認真讀報略知國內國外一些情形。（一九二一年之前，我不大看報紙，這年六月以後，伯昂姪在汕頭定閱

一份上海的《時報》，它的副刊《小時報》很有可觀，我叫伯昂看後寄給我，報紙一到就十多份，實在沒有工夫每份細讀，只把副刊讀了，其餘逐日釘存，目的不是為了保存史料，而是我的一種收藏癖作怪。一九二三年我才經常定閱上海的《申報》、《新聞報》，逐月存起來，如是之三年之久，到一九二六年出國讀書才停止。

說壬戌年是我的現代歷史的啟蒙師，我是衷心承認的，多謝吳佩孚攻擊梁士詒一通電文，引起我對政局的興趣，接下去便是一幕一幕的好戲演出了，戲目是（一）直奉戰爭、（二）直系擁黎元洪續任總統、（三）直系又把黎總統迫下台、（四）直系軍閥頭子曹錕賄選總統、（五）二次直奉戰爭、（六）直系軍閥大崩潰、（七）馮段孫合作、（八）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上面這些好戲是有連續性的，其搬演的時間不過三年（一九二二—二四年），我對於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及其演變的經過，都瞭如指掌。到外國讀書時才把這方面的學問拋在一旁。一九三四年對西洋文學玩厭了，才重續舊歡。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可說是亂糟糟的一團，我恰躬逢其盛，有如讀《東周列國志》，也如讀《三國演義》小說。一九二二年，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北京有個總統徐世昌，而南方又有個開府在廣州的革命領袖孫中山，亦自封總統。各省的小軍閥無數，但左右政局的大軍閥，則只有一九二一年被直系、奉系擊敗的皖系。直系皖系都從袁世凱的北洋集團產生出來，皖系以段祺瑞為首腦，直系以馮國璋為首腦。馮死曹錕接上去。這兩派不時鬥爭，而新興的軍閥為奉系的張作霖。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總統徐世昌為了財政、外交的問題，竭力勸梁士詒組閣，出